



林帆作

柳橋春曉



莆田文史資料

第二十五輯

政协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编

莆田文史資料

第二十五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福建省莆田县委员会
1999年11月

目 录

在莆田县工作四年多的回忆	王 曼(1)
莆田民工参加福建三个支前工程建设部分纪实	陈锦涛(13)
全国名剧团名演员来莆献演盛况回忆	傅绍良(27)
莆田县南北洋水利工程发挥巨大的作用	王金钤(34)
沧桑岁月话平生	丁树元(40)
三中全会前后莆田县委召开几个会议的回顾	林占春(53)
1987 年对港利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调查	林玉树(57)
政协莆田县第七届委员会工作纪实	林兰英(60)
莆田县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简述	陈金锁(72)
莆田县供销合作社机构变动纪述	郑甲麟(78)
莆田县水稻生长与气温的关系	曾昭钦(83)
缅怀林振夏同志为党的新闻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 ...	吴文铿(86)
缅怀许英三先生	王 琛(97)
怀念许英三先生	林启贤(102)
蔡友兰传略	蔡 麟 整理(107)
记福建省耳鼻喉咽喉研究所副所长杨劲松	更 新(110)
记莆田县四位老农业劳动模范	蔡兆元(113)
记连城县实验小学高级教师莆田知青林亚晶	李凤贵(118)

莆八中 14 年回忆录	蔡金耀(123)
解放初砺中的教育改革及学生运动琐记	柯文溥(132)
记莆田县 1974~1982 年田径运动	郑永培(140)
海滨小学探源与发展	郭大卫(144)
下坂小学小史	周玉云(146)
黄瓜岛小学沙滩田径运动场介绍	郑永培(148)
西漳村的烘炉	陈金锁(150)
南梧塘粉心加工记述	吴丕容(152)
发展中的清前村蔬菜生产	周元芳(154)
记下坂红柴专业村	周玉云(156)
 傅作义郭沫若来莆日期考	 傅绍良等(158)
莆田县体育运动先声录	郑永培(160)
九坎店今昔谈	郑甲麟(162)
莆田林氏中医世家简介	林世英(164)
莆田姓氏渊源及其入莆简述(六)	郑景樵(166)
莆田县清光绪年间秀才(部分)录(一)	黄黎强(170)

在莆田县工作四年多的回忆

王 曼

编者按：王曼同志，浙江省天台县人。她于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，第二年10月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建国后转业地方，从事党务工作。1954年至1958年，任中共莆田县委第二书记、晋江地委委员。后调任中共福州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，工交部长；厦门市委常委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。“文革”后，任福建省第二轻工业厅副厅长、党组成员；1983年，退出第一线，任中共福建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。已离休。

现将她所著的回忆录——《难忘的沧桑岁月》中有关在莆田工作的《荔枝之乡风雨多》一段，转载如下。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1954年初，我调任中共莆田县委第二书记、晋江地委委员，1958年底调离莆田到福州市委工作，在莆田工作了4年多时间。

我开始和王运转副书记分管面上农业合作化中心工作，之后，除中心工作外，县委分工要我兼管宣传、文教。土改前后我曾在农村工作过，但搞农业合作化还是缺乏实际经验。我愿意多下乡，多接近基层干部和群众，作调查研究，遇事便向县委同志尤其第一书记汇报请教。我主观上想做好工作，不过错误、缺点还是难免的。

到莆田后，为尽快了解当地情况，我深入基层作调查，从南洋平原到北洋平原，从渠桥、黄石、笏石、北高，南日岛至涵江、西天尾、梧塘，在全县绕了大半个圈子，再上山区白沙、新县、常太、华亭

等,全县 51 个乡镇,差不多走遍了。

莆田县中心南北两洋的城厢、涵江一带,人称“乌克兰”,是稻谷丰产区。木兰溪两岸盛产荔枝、龙眼、枇杷,是驰名中外的三大名果。由于盛产荔枝,莆田又称为“荔城”。这是集镇多,村庄大,人口密,当时仅涵江公社就有 20 万人口。涵江镇过去被称为“小上海”。

莆田沿海濒临闽中,渔场海产丰富,且有海涂养殖和盐业生产的习惯,兴化湾内的三江口是福建省著名港口之一,可停泊 3000 吨级海轮。湄洲湾内的秀屿港,是举世闻名的天然良港,与台湾隔水相望,当时因地处前线,未能开发。

山区的白沙、新县、常太、华亭等乡镇属地形复杂的丘陵地带,山多梯田,间有小盆地。丘陵似波浪般起伏,覆盖着或疏或密的自然林毛竹林。村落小而分散,山民多数居住在独家独户的泥土木屋。这一带山区劳力少,土地多,主要是梯田。

莆田历来人口众多,那时人口就近 80 万,现在已 200 多万了,称得上全国之最。当时每人不到 4 分地,解放前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的人很多,是个著名的侨区。气候属亚热带,一年四季如春。人民俭朴勤劳,解放初期,男女老小都光着脚下田劳动,就是中小學生也大多是光着脚走路,好像是个“赤足城”,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我去的头一年,正值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第三年的重要关头,农业初级社也有了发展,农贸集市上农产品丰富,人人忙干活,个个有饭吃。山区有的村庄夜不闭户,社会秩序安定。

1955 年底,有几个办得较好的老初级社,如双福乡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、沙坂乡前进农业合作社想转为高级社。我们派出工作组去帮助升高级社,并总结初级社升高级社的经验。但到 1956 年,在全国升高级社热潮影响下,莆田全县范围内初级社转并高级社的浪潮迅猛地发展起来,到 1957 年春高级合作社化就基本结束

了。当时有 94.4% 的农户参加到 1316 个高级社来，取消了土地个体私有制和土地分红。

不到一年时间，所有初级社都一阵风地转为高级社了。因为缺乏经验，思想、组织上都没有充分准备，遗留下大量的问题，个别地区甚至社员闹事。如笏石濠塘高级社，社员围在乡政府和合作社门口闹退社，要求分粮食。县委第一书记赵允福要我带一个组蹲点调查，处理这件事。我从农村合作部等单位抽调了一些干部组成工作组，分头住到社员家中去，访贫问苦，调查研究，了解闹事的原因。主要是转为高级社以后，集体经营范围扩大了，干部在管理上不适应，有的干部没有选好，乡社的干部浮在上面，官僚作风；升高级社时，许多遗留的问题没有及时妥善处理，特别是山林、果树、砺石等未入社；有的虽然入了社，但没有通过社员讨论，处理不合理，损害社员的直接利益，影响社员收入和积极性，也影响了农业合作社的巩固。如对果树“管生不管养”，新树无人栽。少数富裕中农囤积粮食投机，雇工砍树。由于林果收入高于农业工分收入，搞副业每人每天 2 元，搞农业每个劳动力一天工分算起来只有 5 角，所以大多数社员去搞副业，无人出工从事农业生产，已收稻谷无人管，发芽变质，地瓜烂在地里无人收。农业生产管理混乱，社员集中在农业社门口等派工，干活临时分派。记工不合理，有的队甚至没有记工分，账目不公布，成了一笔糊涂账，等到年终结账，每户自报良心账。有部分社员没有口粮，春荒青黄不接时，向生产队要求解决口粮，但无人过问。个别人原先当过保长、投机商，钻我们工作错误的空子，挑动群众到乡政府、农业社门口闹事，要求分粮、退社。

我们到了那里，首先发动乡社干部与共产党员，同我们一起摸清困难生产队与缺粮户的情况，组织社员把未收的地瓜收起来，按生产队逐一安排缺粮户的口粮，先把人心安定下来。然后，进一步发动社员群众帮助党支部和乡干部整风。群众提出了不少尖锐、诚

愿的批评意见，如反映一些党员带头搞副业，带头不下地，按季节该种什么不征求社员意见，有些干部混水摸鱼，自己吃得饱，不管有些社员饿肚子，等等。这些批评对乡社干部教育极为深刻。我表示，工作上的错误缺点我们有责任，我们应该检讨。接着乡社干部一个接一个严肃认真地自我批评，并提出改正的意见，经社员群众通过，不行的再次检讨。根据群众揭发，有贪污挪用行为的，放在后面组织专门小组审查。我们还讨论了今后支部如何改正错误缺点、艰苦奋斗、团结群众办好高级社等问题。一连两个星期，我们大部分在晚上开会，一直开到下半夜一两点钟。讨论一个问题，解决一个问题，大家情绪越来越高。我们还召开社员大会和小组讨论会，开始有些沉默，但讨论到切身利益的问题时，就热烈起来了。各组订改正措施，然后转入到整顿农业社、处理办社时遗留问题，这时许多原先坚决要退社的社员也表示不退社了。接着民主讨论生产计划、财务管理等制度。经过长时间从下而上、又从上而下的多次酝酿，最后重新选举了社、队干部。我们在那里与社员同住、同吃、同劳动，过了3个多月的“三同”生活，虽然生活上苦一点，但精神上收获不少。当我们工作组撤回时，社员群众一群群地自动赶到路边送我们，有的还噙着泪花依依惜别。濠塘高级社闹事及处理情况，县委工作组还专门写了书面报告。在一次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，地委张桂如书记认为我处理得当，还要我作了专题汇报，并存有档案。我在莆田工作4年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、学习，提高了对一些事物的认识。在4年中，县委发挥了农业合作社广大社员群众的力量，办了一些建设事业，如大规模兴修水利，兴建东圳水库，但在其他方面，也遇到了一些风风雨雨。

1、大规模兴修水利

1956年到1957年，中央在抓合作化的同时，狠抓了水利建设，省与地区都专门派人来莆田，帮助搞县以上大型水利工程。

莆田县十年里有九年不是旱就是涝，古老的水利工程四大陂长期失修，又不配套，仅能灌溉 16 万亩土地，沿海半岛 30 万亩农田和山区的水利都是空白。所以要解决抗旱防涝问题，就必须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社的力量，兴修水利。

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动员和组织群众，对木兰陂、泗华陂、太平陂、南安陂等四大水利工程的创伤，进行全面整治。单木兰陂南北沟渠疏浚淤积泥土就达 70 余万方，增加了蓄水量。全县约 100 公里的海堤也全部增高加固，像铜墙铁壁一样捍卫着南北两洋 11 万亩良田。还修建了排水闸、涵洞、抽水站等水利设施，全县兴建了 37 座中小型水库，总蓄水量 2118 万立方，灌溉面积达 10.7 万亩。

1957 年全县统一规划，兴修水利，大、中、小全面开花，国家、合作社、生产队大搞协作，互相支持。全省最大、全国闻名的东圳水库，就是在 1958 年开始兴建的，到 1959 年初基本完工。全部工程包括拦河大坝、溢洪道、输水隧洞和纵横交错长达 176 公里的干支渠道。蓄水量 2.8 亿立方米，相当于北京十三陵水库的 5 倍，比本省新建的东张、汀溪、菱溪和石壁四大水库容水量总和还要大。

在东圳水库大会战的日子里，县委全力以赴下到各条战线，分工我看家，还协助布置抽调干部和物资、检查进度等。县长亲临工地任总指挥，抽调一大批干部组织民工上场，并轮流参加义务劳动。民工劳力实行统一安排，轮流换工或按工计酬，保证了东圳水库工程的胜利完成。当时工地一派战天斗地的热闹场面，打夯号子声和机器声齐鸣，板车、手推车排成一行行，大家只有一个心愿，早日建成东圳水库。

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，充分显示了全县人民在合作化后治山治水、改造自然的伟大气魄和力量。

过去莆田一个月不下雨，就是在水利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也会发生旱灾，兴修水利后，50 多天不下雨也不会受旱，过去日降雨

100毫米以上就会造成水灾，兴修水利后，日降雨250毫米也不会造成灾害。仅东圳水库就可灌溉城厢、涵江、华亭、黄石、灵川、笏石、忠门、埭头等乡镇田地50多万亩，结束了莆田沿海十年九旱的历史，而且能拦蓄南萩芦溪上游的洪水，免除北洋平原7万亩农田的涝灾。东圳水库的建成，不仅基本上解决了莆田历史上旱涝之灾的问题，也为建设大水电站创造了条件。莆田人民欢喜雀跃。

2、反右派斗争回忆

1957年2月27日，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的报告，接着党中央又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整风运动，肯定成绩，克服缺点与错误，加强团结，改进工作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。根据中央指示，县委开展整风，发动党内外干部、群众大鸣大放。县委大院内贴出不少大字报和漫画，针对我的现在还记得的有两张：一张漫画画我大肚子还在台上作报告（批评我连生几个孩子），这条算是对的，书记没有计划生育。第二张大字报是说我在莆田医院分娩期间，既吃医院，又要家里送饭，吃了两分粮，实际上是因为有个照顾我的人吃了一分。

因为第一书记工作管得多，在莆田时间比我长，自然要得罪一些人，所以大字报、漫画多些。不过以后有些漫画不署名，画得不像样了。后来中央布置全国要把矛头转向反右派斗争，开始我不太理解，觉得这样做似乎欠妥。因为我一贯无限信仰毛主席，认为中央这样布置总是有道理的，所以后来就没有再去想了。

反右派斗争莆田县委当然要贯彻执行，但是在“左”的倾向影响下，层层抓右派，使反右斗争扩大化，就不对了。反右斗争以后，也放松了对我们自己工作中毛病的改正。

反右扩大化的一个事例是县妇联秘书丁伟。她对个别部门领导作风有意见，写了一张不指名的题为“墙头草”的大字报，结果被

划成右派，夫离子散，送农村劳改，多年后才得到平反，以后听说她在秦皇岛教书。1985年5月我到北戴河疗养时去探望她，并为她在莆田时的科级待遇作了证明。

县直机关大放鸣时，我在分管，但我实际上没有怎么管。之后，县委赵书记要我到山区去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情况，机关反右的事情就由第一书记直接挂帅抓了，据说地委有指示要书记亲自挂帅。

我所到的白沙、新县山区，过去县的领导还没有进去过。那里都是深山密林，人烟稀少，山坡上布满层层梯田，山谷间有些小块盆地。农作物大部分是单季稻，产量不高。但山上有丰富的土特产，满山遍野尽是毛竹、竹笋、药材，还有原始森林和矿藏，因交通不便，运不下来。出入走的是羊肠小道，买点盐要走十几里路。山上气候比山下冷得多，我们上山时是夏天，碰上龙卷风，下了鸡蛋那么大的冰雹，有个山头上的小村子损失极大，不少房子和牛棚被风刮倒，有的屋顶被卷走。

我们与区委几个同志一起去这个小村进行慰问，调查了解受灾情况，同群众一起讨论生产自救的办法。这里群众很热情，见到我们上山来十分激动，一位老大娘拉着我的手不放，说：“共产党最爱护我们穷人。”我们离开这个小村子时，他们一直送我们到山边，群众的深情厚谊使我很受感动。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做得太不够。我回到县委汇报后，县委同意派一批交通、财贸、供销社干部上山，解决公路运输以及农产品收购、日用品供销等问题。

3、大跃进的反思

那几年，莆田干部和人民以冲天的干劲（谁要不干就要受批评）推进农业合作化，大规模兴修水利，大搞积肥（土杂肥、河泥）。全县粮食生产连续获得增产，到1957年全县平均亩产746斤，比1949年平均亩产343斤增加1倍多，由缺粮县变为自给县。经济

作物主要是龙眼、荔枝、柑 杷等水果的面积增到八九万亩，但产量增加不多。在大办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这段时间里，稻谷成熟了无人收割，地瓜烂在地里无人去挖，损失不少。有些地方增产了，社员未必增收。

当时全县粮食亩产达到或接近《农业发展纲要》规定四、五、八的要求。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，想多搞点，一心想建设得快点，对形势估计过高，粮食生产提出“翻番”的目标，全面大跃进开始了。本来步子已经快了，如果巩固、调整、整顿一下，形势就会好转。但极“左”思潮越发展越严重，急于求成，过分夸大主观能动作用，出现了共产风、浮夸风、命令风、干部特殊风、瞎指挥风等“五风”，农业生产遭受很大挫折，农民生活发生了困难。

1958年春，我在哆后高级社蹲点，推广外地小株密植、优良品种——朝鲜梗稻的经验。当时还有一位技术员，是省农业厅派来专门搞试验田的。那一片金黄色的稻谷大面积丰产的景象，不知吸引了多少人前来参观。丰收在望，队里有些干部头脑发热，产生了不正确的思想，虚报产量。本来亩产单产4000多斤就了不起了，他们听到省里对高产农业社会奖拖拉机，竟报亩产7000多斤。我在那里收割稻子，验收时，因为人太多，他们把谷子挑到打谷场，把不是实验田收割的谷子混在一起凑数。当时我没有发现，不过我听那位农业厅的技术员说没有那么多产量，我对此也有怀疑，可是高级社却把产量报到县政府了。我对第一书记说，可能哆后没有这么多产量。他先不吭声，随后又说：“我们应该相信哆后党支部的报告。”省农业厅王厅长来莆田，找我了解哆后的产量，大概是技术员反映上去的。我把技术员反映的情况向他说了一遍，他就向晋江地委书记说了以上情况。地委书记特地打电话要我去谈哆后产量问题，我仍如实说了。他的态度同县委第一书记一致，他说，技术员又未参加验收，还是要相信哆后党支部的报告。我本来有怀疑，可稻谷已收

割了，我想不必再谈，以免影响下面的积极性，就这样算了。回来后社里开了庆祝大会，省府奖一辆拖拉机，当地驻军也赠送马车等。

从此以后，推广小株密植简直昏了头，还认为越密越好。有人甚至提出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的违反科学的口号，提出水稻亩产超万斤指标。我们在哆后、埭里的县委办公室试验田，有的一亩用五亩秧苗并在一块，我也参加移苗劳动，但心里总有点不踏实感。有一次《莆田报》总编丁树元同志同我一道去看试验田，在回来途中谈起移苗并丘的事，两人都感到不对头。移苗伤了稻根，移苗后田里又密得连空气也透不进，这么做哪能增产增收，只会减产减收，如果大面积推广下去，就会没有饭吃，饿肚子。以后丁树元同志回报社也讲了以上观点，当时大家也同意这个看法，但到1959年反右倾时，却把它翻出来，作为右倾材料批判丁树元，其实他说了老实话。那时我已调福州工作了，否则也要受到批判。

当时各地一些经验介绍材料上说，社员年平均收入1000元以上，可说接近共产主义了。我对此不理解，那么容易就能达到“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”的共产主义社会吗？

当时大跃进的调子越来越高，以高指标和高产竞赛为内容，插红旗、拔白旗、反右倾越来越凶了。不久，莆田县委拔了县委副书记钱文亨的白旗。因为他分管农业合作化工作，被认为步子太慢了。其实我对他的印象很好，他讲究实效，并且敢于直言。批判钱文亨同志对我震动很大，我考虑自己在莆田不能再呆下去了，因为我心直口快，不知哪天也会被当作“白旗”拔掉。当时汪大铭在福州住院治病，我乘此机会要求调到福州工作。省委组织部考虑到汪大铭长期在福州住院治病的情况，照顾我们，将我调到中共福州市委工作。

4、莆田的人民公社化运动

莆田从农村大辩论开始，再进入共产主义教育。接着河南首先

诞生了人民公社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全国农村。当时说人民公社特点是一大二公，大就是规模大，公就是人民公社比农业社更社会主义。人民公社是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相结合，既是生产组织单位，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。

1958年9月初，莆田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和地委在永春会议上的布置，抽调干部组成3个组，分赴涵江、黄石、华亭3个地区进行办人民公社搭架试点。但试点开始没几天，为了赶上快速发展的形势，县委好几次研究规划，并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布置，终于在1958年10月1日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。全县原有51个乡镇，493个高级社，并成城厢、涵江、黄石、笏石、埭头、忠门、灵川、新县、庄边、华亭、常太、南日12个人民公社。加入人民公社的户数由原有农业社户数的158159户增到167414户，占全县总户数的99.74%。涵江公社最大，有20多万人口。

大跃进一日千里，仅两个月全县就公社化了。没有试点，又没有经验，把高级社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、公共积累、储备粮等无偿调归公社所有，分配拉平，吃饭不要钱，盲目地进入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。全县各公社、生产队开始大办公共食堂，衣食住行、婚丧喜庆、医疗卫生、教育等费用全由公社统包。大家吃大锅饭，出工不出力。以后粮食吃空，食堂不得不自行散伙。

不久，党中央下发了《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定》，贯彻三级所有制，队为基础，开始开展整风运动，纠正“左”倾错误。那时我已调到福州工作。

在莆田县委，我虽然不是第一书记，但是第二书记，是第一书记的助手。人民公社发展过快，企图一步登天，幻想几天就实现“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”的共产主义社会，我们实在太天真了。当时没有科学头脑，一味蛮干，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，以后给群众的生产、生活带来很大损失，这些我都负有一定责任。在这段时间里，

处在极“左”倾向压力下，处在县委打头阵的位置上，我当然也是“左”倾路线的执行者，但也是受害者，正反两方面教训都是深刻的。

县委常委班子基本上是团结的。班子成员大部分来自山西的南下干部，农村小知识分子占多数，对农村工作有一定的实践经验，但文化科学知识、唯物辩证法知识浅薄，按上级指示照搬照套多，结合本县农村实际情况考虑少，家长式指挥已成习惯，特别反右派后，怕提领导意见，怕戴上“反党”的帽子，谁要提意见都捏了三把汗。

我在莆田县委工作4年多时间，除生孩子产假期，以及第一书记要我在家主持工作外，一年中我有半年时间下乡蹲点或分片包干下面工作。这期间，县委班子干劲十足，我当然也不敢落后，如县委经常夜里开会或召开全县电话会议，一开总是开到下半夜一两点钟，有时还结束不了。大家实在支持不了，个个东倒西歪，有的趴在桌边打起呼噜，有的靠在椅背上睡着了，有的半醒半睡，甚至有一次主持会议的县长也在边讲话、边打瞌睡，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好笑。

我在这段工作期间，自己感到在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上都有许多缺点甚至错误。工作上盲目性很大，缺少周密计划，处理问题有时简单、急躁、主观，也有自满情绪。后期有思想顾虑，不安心在莆田工作。

附：王曼同志在《福州市委工作六年》中有一段关子下到莆田工作的记述：“在这期间，值得一提的是，省委叶书记在1961年冬到莆田调查了解水灾情况，寻求灾后生产自救的门路。因为我在莆田工作过，所以指名也要我去莆田参加救灾工作，并准许带一位同志去。我带了潘子贞同志，随即到了莆田哆后重灾大队，召集大队

干部、技术人员和老农座谈，听取了他们许多好意见，总的一个精神，不要坐在荒地上等政府救济，自己不动手，冬种时节很快就过去了。根本问题是调动社员生产自救的积极性，最好是让每户社员向生产队借种一亩水淹田，有条件的可以超过一亩，谁种谁收归谁所有，也就是“自由一季”。我把座谈会情况向叶书记写了一个专题报告，叶书记看后，采纳了“自由一季”的建议，很快将文件批下去。“自由一季”对当时灾荒粮食困难起到一些缓和作用，可是在以后的“文革”中，这件事也成为叶书记的一条罪状，我也遭到严厉的批判。

（摘自王曼《难忘的沧桑岁月》，丁树元同志供稿）

莆田民工参加福建三个支前 工程建设部分纪实

陈 锦 涛

1955年3月至1956年4月间，莆田县民工先后参加福建省817工程（连江县黄岐半岛支前公路）、6129工程（义序机场）、鹰潭（潭）厦（门）铁路等三个支前工程建设，经过一年零一个月的艰苦奋战，胜利地完成了任务，载誉归来。最后，还动员民工500多人就地安家落户，开发山区。

因时隔已久，现仅凭记忆和一些资料进行整理，有错误和不妥的地方，望知情者补充指正。

抢修817工程

1955年3月15日，莆田县人民政府召开支前干部工作会议。县长郝纯作形势与支前任务的报告。任务是抢修福建省817工程。

全县共抽调县、区级和一般干部及半脱产干部140多人，作为民工大队、中队、小队的领导干部。民工8200人，其中，从沿海十六至廿三区动员6100人，平原各区2100人。

共组成4个大队，27个中队。每中队300人，正副中队长、指导员由脱产干部担任；会计、统计、总务由半脱产干部担任，多是从复退军人和知青中招聘的。每中队设10个小队，正副小队长由乡主干或党员积极分子担任。

民工条件：年满18至50岁的男性公民，政治要可靠，并要求